



Young J. Allen

传教士新闻工作者在中国

林乐知和他的杂志 (1860-1883)

Adrian A. Bennett [美] 贝奈特 著

Missionary Journalist in China

Young J. Allen and his Magazines,

1860-1883

丛书主编 周振鹤

译者 金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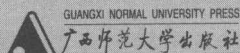
传教士新闻工作者在中国

林乐知和他的杂志 (1860-1883)

CHUANJIAOSHI XINWEN GONGZUOZHE ZAI ZHONGGUO
LINYUEZHI HE TADE ZAZHI(1860-1883)

Adrian A. Bennett [美] 贝奈特 著

丛书主编 周振鹤 译者 金莹



· 桂林 ·

First publish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y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Athens, Georgia 30602
Copyright © 1983 by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0-3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教士新闻工作者在中国：林乐知和他的杂志：
1860—1883 / （美）贝奈特（Bennett, A.A.）著；
金莹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7
（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 / 周振鹤主编）
ISBN 978-7-5633-8691-8

I. 传… II. ①贝…②金… III. ①林乐知
（1836—1907）—传记 IV. ①B979.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364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541100）

开本：720 mm × 970 mm 1/16

印张：20.5 字数：280 千字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3 000 册 定价：5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传主简介

林乐知 (Young J. Allen)，美国监理会来华传教士，1836年出生于佐治亚州，1907年在上海去世。1860年林乐知偕夫人来上海传教，曾担任过上海广方言馆的英文教习，参与过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书工作，还创办了中西书院等学校。林乐知在华期间编译了许多有关外国历史、地理及自然科学的著作，并创办了对近代中国和中西文化交流产生深远影响的《万国公报》（其前身是《教会新报》）。《万国公报》是晚清时期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知识的最重要的刊物之一，为中国近代的改革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内容简介

本书为林乐知从出生到1883年的传记，包括他早年在美国埃默里大学的学习、来中国后在上海所做的调整、在上海广方言馆教书、发展他自己独特的传教方式等，重点分析了其创办的《教会新报》（后改名为《万国公报》）的内容。林乐知重视发掘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他拓宽了对基督教的定义，他在其所创办的新闻杂志中不仅强调宗教内容，也强调教育、科学、经济和道德发展的重要性，并对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改革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林乐知认为中国发展教育的关键是转变知识分子的观念，他通过新闻工作寻求到了一种与中国知识分子沟通的方式。

《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序言

周振鹤

传记就是历史。中国的二十四部正史,全部是纪传体体裁,大致由本纪、列传、表、志四类不同形式的文字组成,其中列传主要就是历史人物的传记,占了所有正史里的最大分量。本纪则是帝王的活动记录,也可以视为他们的传记。所以我们不妨可以说历史主要是由传记组成的。人是历史活动的主宰,所以人的传记自然就是历史的最主要组成部分。西方的情况与之相类似,用历史学家 Heinrich Simon 的话说,传记是最好的一种历史。一个人的生活如果袒露在我们面前,那么他所思想和他所做的一切,就给我们一个对他所处时代的历史的较好的领悟,比其时所有总的记录可能给我们的还多。因此重视传记就是重视历史,阅读传记也是阅读历史。这就是出版这套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在学术上的一般意义。

这套丛书还有其特殊意义。那就是从晚明以来的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外关系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可以笼统地说,晚明以来到达中国的西洋人主要有三种:一是传教士,二是商人,三是外交官。但从晚明到清代中期,能深入内地,能深入宫廷与民众之中的人只有传教士,甚至在乾隆年间严禁传教的情况下,依然有许多传教士秘



密进入内地。而商人历来只能活动于澳门与广州,有时再加上其他一些沿海港口,至于外交官则只有使团性质的短暂停留。晚清以后,商人与外交官的活动显著加强,但传教士来华的活动则更加公开也更加深入,其影响程度依然远在外交官与商人之上。

与此同时,传教士中的佼佼者或者知名度较高者,其主要功绩或在历史上的重要表现并不在传教的成绩方面,而在于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贡献,或在中外关系史方面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有好有坏)。他们在中国登堂入室,不仅影响一般人的普通生活,甚至还参与了中国的政治生活,干预了中国的外交活动。其中有不少人或者留下重要著作,或者介绍中国文化于西方,或者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于中国。有的甚至成了汉学研究的先驱或真正意义上的汉学家。虽然传教是他们的最重要使命,但其实有的传教士在这方面完全乏善可陈。例如德国的传教士卫礼贤就曾经说过,他在中国从未成功劝导过一人入教。所以无疑地,通过阅读传教士的传记或与传记相关的资料,我们又无异于在加深对中外关系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了解。

当然,传记并不总是全部可靠的。因为写传记的人与传主的关系可能会影响传记的可信性。与典章制度的记载不一样,历史上这方面事实基本上是秉笔直书的,但人物传记不同,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在中国都是儒家的教导,在外国也未必不如此。加上私人之间的恩怨或利害关系,就使得传记会有不实的成分。同时传记也不好写。不好写是因为除了叙述事实以外,还要对传主有所评价。而历史人物的评价始终是历史研究中的难题。对于大部分的历史人物很难有一个大家公认的评价,甚至是最公认的雄才大略的爱国者或是臭名昭著的卖国贼,也都会有不同的看法。更有甚者,历史人物的所谓定评还可能随时被推翻,而作翻案文章也始终是最有卖点的工作甚至是特别的成就。而如果这些传记牵涉到来华的外国传教士,那么问题就更加复杂。

基督教入华有过四次间断的过程。其中后两次,即晚明至清前期天

主教传教士,以及19世纪以后新教传教士更为重要。直到1949年以前,在华的外国人中,仍以商人、外交官与传教士三种人为主,其中传教士的数量最大,如果倒退到晚明清初,绝大部分在华的外国人差不多都是传教士。无论明清之际或晚清,这些传教士在中西关系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有的甚至起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所以很自然地,在汉学领域里打先锋的都是传教士,无论天主教还是新教都是如此。传教士的第一目的自然是传播基督教义,但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首先必须贡献中国文化所欠缺的东西,才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于是西方的科学与文化就成为传教的媒介。为了传教他们还必须学习甚至精通中国语言文字,他们也由此理解与研究了中国积淀数千年的丰富博大的文化,在17世纪与18世纪时他们将这一文化的详情(有时不一定是精髓)以各种方式传播到欧洲去。当时的传教士研究中国有一点为艺术而艺术的味道,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其有何实用价值。当然他们也有所图,那就是在欧洲文化出现危机时,试图以中国文化来济欧洲文化之穷。虽然这只是一种愿望,但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值得重视的课题。

当法国在1815年正式建立起汉学讲座,标志欧洲汉学研究的纯粹学术化,把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变成一门学科的时候,其实是传教士奠基了两百多年中国研究以后的必然结果。同样英美等国汉学的建立,也是新教传教士筚路蓝缕的结晶。这些传教士不但是开路先锋,而且本身具有很好的素养与研究成果。在中西文化交流史方面,我们不能无视传教士的功绩与影响。除了学术方面,清初的传教士还影响到中国的宫廷生活甚至皇帝的某些决策,在晚清则甚至干预到中国与列强的关系,有的传教士的确在中外关系史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所有这些都应该得到很好的清理。而传记的写作与翻译就是这种清理工作的具体体现。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学术上对传教士并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所有传教士都被视为文化侵略者,尤其是新教传教士大多是在鸦片战争后偕枪炮俱来,除了文化侵略以外,还被看成是帝国主义的直接帮



凶。近些年来,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有所进展,但又出现另一种倾向,似乎所有传教士都完美无缺,都是中外关系与中外文化交流的积极推动者。实际上,这样两种倾向都是缺乏历史理性,也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为了正确地认识传教士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做一些基础性的建设工作,也就是将四百年来传教士的活动进行具体而微的研究,而不是大而化之的空论,而其中最直接具体的莫过于传教士传记的撰写,将每个传教士的言行完整全面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一工作西方学者已经走在我们前面,因为他们有资料方面的优胜条件。虽然西方学者的这些传记未必尽善尽美,但在我们未曾有自己撰述的新传记以取代它们时,我们不妨先将这些传记翻译过来,以作为我们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实际上,由于这些传教士的主要传记资料都在西方,所以即使我们有意重写这些传教士的传记,我们也不得不大量依靠西方的文献资料。

对于明末清初天主教士的传记已经有人进行过很好的研究,有些已经翻译过来。而对于新教传教士,因为禁忌较多,半个世纪以来,在国内基本上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即使早有传记行世的,也始终没有人进行翻译。例如作为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丁韪良,他的自传性质的《花甲忆记》,就始终没有全译本。对于第一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虽有不止一种传记译本,但对其夫人所编辑的保持原始资料较丰富的《马礼逊回忆录》以及《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也始终无人译出。基于以上种种原因,这套丛书的译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坚持将尽可能原始的材料翻译给那些没有太多时间去找原著,或读原著比较费时费事的读者。选取的原则首先是以本人的回忆录或书信集为主,其次是他人所写的传记。传记里头又以作者为传主亲近者为先,其次才是专家所写的学术或思想评传。目的不为别的,主要是为了先把比较原始的资料呈现给大家,而暂不作任何评论。如果要说的话,也是由读者去做,译者与主编者并不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有任何高明于读者之处。这就是编辑这套丛书的宗旨。而

且这样做对历史研究还有一些明显的好处,因为越是原始的材料往往越能够体现历史的本来面目。例如本丛书中的《卫三畏生平及书信》就比较直接地暴露出了卫三畏的一些殖民者的观点与行为,其中对中国人的蔑视、提倡侵略中国的必要,都是通过他自己的书信表现出来的,让我们更能充分认识其人的全貌。也许今天的学者为其写传记,担心触怒中国人民的情感,倒可能删去一些内容,这反而掩盖了历史的真相。这就是我们尽量选取原始的传记资料的另一个原因。相信读者是不会以为译者、编者与出版社同意或赞赏传记中所呈现的传教士的错误观点与行为的。

宗旨确定以后,在实际工作中,却遇到一些具体的困难。荦荦大者有二:一是传记原著本身的不足。有的传教士很有名,但却没有人为他们写传记,如傅兰雅,如伟烈亚力,都是19世纪来华的鼎鼎大名的学者,而且对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民有深厚感情,但在西方至今未有一本传记问世。傅兰雅,还有人为其做了一本类似年谱长编的未出版的稿本,而关于伟烈亚力,则只有一些纪念性文章而已,颇令人感到遗憾。二是难译。难译主要不体现在原文的艰深,而是复原的难度。中国的人名、地名、职官名与其他专用名词从西文回译到中文,有时要费很多的时间与精力。如丁韪良在《花甲忆记》里头提到某天总理衙门的三位值班大臣时,说他们分别姓xu(阳平)、xu(上声)、xu(去声),乍一看,会以为丁是为了说明汉字四声读音之难而编出来的,未必真有其事,而且前两个音可以复原为“徐”与“许”,第三个拼音则颇费踌躇,后来查了当时的文献,才知道确有其人其事,第三位是蒙古族,其名字头一字是“续”。这查核文献之工夫有时比翻译本文的时间还要费得多。所以译者不但要精于西文,而且要熟悉中国历史文献与历史事实,才能使传教士传记达到杰出的翻译水平。

所幸这一丛书的头三本,即《花甲忆记》、《马礼逊回忆录》与《卫三畏生平及书信》,都有很好的译者,他们不但英文功底深厚,而且对所译传记的传主都有深入的研究,发表过有关的专门的论著。在译作如林的今天,读者一定会对他们的翻译水平作出正确的评价。

前言

19世纪中华帝国和西方世界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一个令人兴趣盎然的课题,时至今日却仍未被史家们理解透彻。众所周知,在19世纪下半叶,一方面美洲和欧洲之间的接触越来越频繁;另一方面,欧洲和中国的接触也日益增多。那么这种接触和在中国最终形成的改良及革命运动之间有什么联系呢?西方对中国近代转型的具体贡献又是什么呢?

要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必须从研究中国内部的发展——包括文化和政治的——入手,因为它们对来自西方的影响作出了回应或抵抗。但是我们也有必要用尽可能具体的方式,来定义西方在中国的活动的本质。作为一种正确的历史研究方法,一个人在着手研究前,有必要了解西方为中国提供了什么,以及在中国自身发展的背景下理解中西方交流所带来的影响。

本书的研究试图通过一个传教士不足二十五年的传教生涯的有限视角,来确定西方文明的哪些要素被带到了中国,以及西方文明中哪些被西方人自己挑选出认为最能满足中国的需要。我选择的案例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为林乐知是中国第一份登载新闻报道和背景文章(background essays)的杂志的创始人,该杂志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份关注社会批评和提供改革建议的刊物。这份杂志创办于1868年,最初起名为



《教会新报》(*Church News*),主要在中国的基督徒中发行,1874年更名为《万国公报》(*Chinese Globe Magazine*),面向更加广大的读者,刊登的主要是公众关心的世俗内容。1883年林乐知接受了监理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驻华传教士团负责人的任命,杂志一度停刊,1889年又恢复出版,林乐知仍然担任主编。这份杂志在中国19世纪90年代的改革者之间广为流传,今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它早期(1868—1883年)出版的内容,更无人对其进行研究。然而,在杂志创办的早期阶段,康有为曾于1883年在上海购买了这份杂志,此后他回到广东撰写了他影响深远的著作,其中描绘了人类进步、平等的乌托邦社会,以及建立相关机构推进个人福利和自治。

在进入对《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的研究之前,有必要了解这份杂志的创办人。本书的前三章对林乐知从出生到1883年的人生旅程进行了描述,并聚焦于他自己发展的独特的传教方式,以及他扩展了的关于基督教的信息。他最早的活动可追溯至美国南北战争前他在佐治亚州埃默里大学(Emory College)学习的经历,但对理解他的传教事业更为重要的是他在上海做的一系列调整——学习中文、在隶属于政府兵工厂的一所学校教书、发掘中国的知识分子及其精神需求、重新定义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包括强调科学、经济和道德发展的重要性。中国的教育体制的创新——包括男女平等——逐渐变成林乐知最为关注的方面。因为他相信发展中国教育的关键在于转变知识分子的观念,因此他试图通过传教士的新闻事业寻求一种与中国知识分子沟通的方式。

最后两章分析了1868年至1883年林乐知所创办的杂志的内容。这里涉及的不仅是林乐知,还有中国的基督徒、为杂志撰写文章的传教士(大部分是英国人)。毫无疑问,林乐知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这实际上也是林乐知与投稿者所进行的思想互动。林乐知不仅承担了编辑的工作,他还为整本杂志定下了基调,因此投稿者的文章与编辑的文章实现了和谐一致。我对林乐知本人撰写的文章进行了相对详细的分析,我也试

图分析其他投稿者撰写的文章,以及杂志中的宗教、中国和西方的新闻、科学和技术类内容等板块。关于杂志的连续性以及转型期——特别是《教会新报》向《万国公报》的过渡阶段——本书特别给予了强调。我也调查了至1883年为止杂志的受众和发行情况。

该研究的第一部分主要是依据林乐知的个人档案,这些档案保存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伍德拉夫图书馆高级研究中心特藏部(Special Collections Department of the Robert C. Woodruff Library for Advanced Studies, Emory University, Atlanta, Georgia)。我要感谢特藏部的主管戴维德(David Estes)先生及他的同事,没有他们的帮助,这项研究的大部分将无法完成。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南卫理公会大学布里德威尔(Bridwell)图书馆的马俪文·沃尼克(Marion K. Warnick)在确认收藏于该馆的由林乐知撰写发表在杂志上的一些信件和文章方面给了我很大帮助。

我特别要感谢林乐知已去世的外孙乔治·罗埃(George R. Loehr)先生,1967年他在理查德·额温(Richard G. Irwin)的建议下公开了林乐知的信件、日记,以及其他由他保管的各种手稿。目前这些材料和林乐知的收藏品一起存放在埃默里大学伍德拉夫图书馆高级研究中心。

《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可以在数个地方找到。其中有一份被装订成册,藏于加利福尼亚州克莱尔蒙特(Claremont)学院霍纳德(Honnold)图书馆,可封面和目录在装订时被去掉了。该杂志的缩微胶卷则藏于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华盛顿大学图书馆,1969年在台北出版的四十卷重印本即以此为依据。杂志最完善的版本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的东方印刷书籍和手稿部(Department of Oriental Printed Books and Manuscripts)。非常感谢该部职员为我提供1868年至1883年两份杂志每期目录的复印件。由于每一期的出版日期只标注在目录页上,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将无法确认任何一期杂志的准确出版时间。

在这里我必须提到来自刘广京(K. C. Li)的持续鼓励。如果没有他



在过去十年中热情地支持,这一研究将是无法实现的。对于那些读了这本书的草稿并给予指导和评论的人士,我也在此一并感谢。在这些读者中,我特别要感谢下面这些人,他们是:已去世的罗荣邦(J. P. Lo),白纳特(Suzanne Barnett),小海亚特(Irwin Hyatt),丹尼尔·贝茨(Daniel Bays),梁元生,石汉椿(Richard Shek)。我还要感谢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和爱荷华州立大学对这项研究提供的资助。

其他人对本项研究的完成提供了间接的帮助。感谢我已去世的妻子辛西亚(Cynthia)以及我的孩子们,感谢他们在周末让我能独自一人安心于学术。对于这种“伟大的隔离”,我非常感谢他们,并希望这些时间将来能用其他方式予以弥补。我特别要感谢我已去世的妻子,当我们早些年在一起时,这项研究就已经开始构思、研究和写作,没有她的帮助和鼓励,我可能就不会如此勤奋地去完成它。令我感到特别悲伤的是,她没能活着看到这本书的脱稿和出版,这是她非常期待的成果。我知道她并不热衷于把书作为一种镌刻记忆的载体,但我还是要把这本书献给她作为对她的感谢。

贝奈特(Adrian A. Bennett)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美国南方的背景	001
第二章 在上海的调整,1860—1867	015
第三章 拓展信息,1868—1883	044
第四章 《教会新报》,1868—1874	089
第五章 《万国公报》,1874—1883	136
结 论	205
注 释	217
附录一 1859—1860 年林乐知从佐治亚州带往中国的图书目录	285
附录二 1871—1881 年林乐知为江南制造局翻译的图书目录	289
附录三 常见传教士姓名中英文对照表	293
专业词汇中英文对照表	294
参考文献	303
译后记	309

美国南方的背景

1835年至1836年的假期没有给艾伦的庄园带来任何节庆的氛围，因为年轻主人的去世，所有人都沉浸在对其哀悼的悲痛之中。不过，在1月3日的晚上，一些蜡烛的微弱光芒划破了屋子里的黑暗。几位妇女聚集在一间卧室里。其中的一位南方妇女，两个月前刚刚成为寡妇，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一个男孩，取名安德鲁·杨格·约翰·威廉·艾伦(Andrew Young John William Allen, 即本书主人公，中文名林乐知。——译注)。尽管孩子出生后几个星期他的母亲也去世了，但那天晚上屋子里的悲伤氛围被驱除得一干二净。

林乐知生长在佐治亚州，他以和同龄人不同的方式度过了成年期。在二十一岁的时候，他决定成为一名传教士并自愿去中国工作。这一决定使得他开始了在中国长达四十五年的担任传教士、教师和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生涯。林乐知的这一决定使得他在当时的南方同龄人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与北方相比，监理会发出了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成为传教士的号召，但是响应者寥寥。在19世纪50年代的中国，除了林乐知，从监理会派来的传教士只有三人，而北方教会派遣的人数已达九人之多。在往国外派遣传教士方面，佐治亚州的教会显得尤其落后。



至 1858 年为止,在林乐知提出志愿之前,该州只有一人成为传教士,这个人在 1833 年时被派往非洲服务。¹1859 年 12 月,当林乐知和全家从纽约搭船起航时,也只有一名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监理会传教士及其家庭和他們同行。

与其他大部分传教士不同,林乐知非常富有。他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一个相当大的种植园和一群奴隶。林乐知从小由一个姨妈抚养,他自己用种植园的收入来支付全部的教育费用。当他作出去中国服务的决定之后,他发现没有人愿意为他和他的家庭的长途“旅行”提供资金。于是他变卖了大部分的财产,只留下了一栋小房子和一些铁路股票。本来只要林乐知愿意,他可以生活得相当舒适,但是他拒绝了这种生活而是选择去过另一种充满崎岖和孤独的生活。他是如何作出这一决定的?是什么影响了他的选择?想要寻找这些及相关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从分析他少而又少的早年生活记录入手。

虽然现存的资料不可能回答林乐知个人动机的种种问题,但这些资料提供了林乐知所接受的大学教育、他的宗教信仰的本质和他成长的真实环境等信息。这些因素无疑直接影响了他日后在中国的职业生涯。他所受的教育为他成为传教士和新闻工作者打下了哪些基础?基督教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的思想是否同时受到了最新的“觉醒的人道主义思潮”以及在美国的宗教生活中发展的物质文明(material progress)的福音的冲击?林乐知所受的宗教和世俗方面的教育,以及 19 世纪 50 年代美国南方的社会和经济状况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些问题。

南方的环境

19 世纪中叶,美国南方诸州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无法与北方相提并论的。在南方,农业,特别是棉花生产,是生活的中心,而北方已经快速实现了工业化,工业方面远超南方。对白人上层阶级来说,棉花贸易为

他们带来了财富,因为在 1812 年到 1860 年间,棉花出口占了全美出口贸易的一半。²然而在这一时期,随着烟草加工、钢铁铸造、水稻种植以及棉花、面粉、木材和棉籽油等的生产技术的发展,南方经济中也出现了多样性和工业化的特征。至 1860 年,南方铁路总里程增加了 9211 英里。³不过这些发展仅存于三个主要的城市——里士满、查尔斯顿和新奥尔良,这意味着工业化的进程是相当有限的。⁴

但是,南方报纸的发行量在 19 世纪 50 年代却翻了一番。除了地方新闻,报道的内容已经涵盖了国会辩论、异域新闻,一些主要的报纸上还登载了大量有关政治议题的通信的详细内容。⁵

教育领域也受到这一变化带来的冲击,开始复兴。经济的富庶和宗教派别之间的斗争使公众对小学、中学和大学各个层次的教育愈发地关注。⁶美国南方改进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的需要变得愈发明显,因为在南方,白人的文盲率最高,学生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最低,图书馆数量也是最少的。⁷1850 年,佐治亚州的白人人口约为 50 万,拥有 13 所“大学”共约 1500 名学生,有 40 家非私人图书馆,藏书量约 5 万册,此外还拥有 22 种文学和科学出版物,总发行量约为 4 万份。这已是南方各州中表现最好的了。⁸

当时美国南部的中学大多数都是私立的,提供数学和测量学的培训,也教授希腊文和拉丁文,为学生升入大学打下基础。⁹尽管大学“发现”它们自己在“理智上”(intellectually)受所属社团的种种牵制,但学校的数量在 19 世纪 50 年代还是出现了显著的增长,学生的入学率也大幅提高,南方这方面的增长甚至超过了北方当时的增长。¹⁰而且,在这几年里,一些新的课程也被引进课堂,学校开始提供更多科学领域的课程,不过不是很多。此外大学还开设有近代历史或当代文学的课程。

在教育层面出现的众多新趋向中,最有意义的可能是 19 世纪 50 年代南方学校对反对奴隶制的思想进行清除的尝试。在当时南方是禁止使用北方出版的关于奴隶制及相关问题的书籍的,包括北方出版的教科书。